

香港《立報》主導權問題重探*

樊善標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引言

一九三五年創刊於上海的《立報》，其主要創辦者成舍我(1898–1991)是中國現代著名報人及新聞學教育家，一生在不同地方辦報、辦學，也進入建制參與政治。據成舍我的定位，《立報》是一種「小型報」，即開度和篇幅類似早已流行的「小報」，但內容和格調與「大報」看齊。¹《立報》吸引讀者，既在於「精編」的新聞，也得力於副刊的規劃。在最早期每日出紙一張的極有限篇幅內，《立報》竟有三個副刊，編輯謝六逸、薩空了、張恨水等，都是一時之選，是以營運不到兩年，即創下驕人的發行銷售紀錄。²及至1937年上海淪陷於日本，《立報》隨之停刊，翌年4月，在香港復刊，版面結構仍如舊貫，主持副刊編務的有茅盾、薩空了、葉靈鳳等著名文化人。只是直到1941年底香港淪陷於日本為止，銷情皆無復上海時期了。³

* 本文為香港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資助項目「香港《立報》(1938–1941)副刊研究」(編號14616115)的部份成果。承蒙沈海燕博士、陳偉中博士協助蒐集及整理資料，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前副館長黃潘明珠女士指教有關出版法例及報刊註冊規定，臺灣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李蘭琪組長解答與原始資料相關的問題，須文蔚教授在國立清華大學「台港文藝與跨文化交流」工作坊上惠示高見，在此謹致謝忱。

¹ 成舍我說：「小型報是 Tabloid，他主要原則是要將一切材料，去其糟粕，存其精華。換一句話說，即小型報乃『大報』的縮影，他每一篇文章每一條新聞，最好都不超過五百字。……他的工作重心，在『改寫』與『精編』。……至於『小報』，通常了解的意義，正即西方所指的『蚊子報』Mosquito Paper，不競爭新聞，不重視言論，它只以亂造無稽謠言，揭發個人陰私，為其首要任務，正如夏夜之蚊，到處嗡嗡，擾人清夢，惹人厭惡。」見成舍我：〈由小型報談到「立報」的創刊：解答若干人士對「立報」三項疑問〉，載成舍我：《報學雜著》(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年)，頁119–20。

² 參李時新：《上海《立報》史研究(1935–1937)》(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7–81、100–101。

³ 曾任職香港《立報》的卜少夫說：「香港立報一直未能打開局面，成為暢銷報，因為那個時候香港的老廣們還不能接受立報的那個風格。」見卜少夫：〈我的老老闆成舍我〉，《新聞天地》總第2254期(1991年4月27日)，頁12。另參曹聚仁：〈《立報》三傑〉，載曹聚仁(著)，曹雷、曹憲鏞(編)：《上海春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70；李家園：〈令香港人眼界大開的三份報紙〉，載李家園：《香港報業雜談》(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頁142。

儘管如此，日後論述香港文學史者，仍常把香港《立報》放在顯著的位置，認為對香港文學的發展大有貢獻，較早的例子如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說，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後，「廣大香港同胞都有愛國精神，捐獻金錢，輸贈軍事物資和醫藥用品，支援抗日將士。國內新文學運動也在香港開展，在中共南方臨委的組織和領導下，香港文壇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抗戰初期，出現了香港文學的高潮」。⁴謝氏沿用當時中國大陸現代文學史論的主流觀點，即抗日的文學是進步的文學，而文學界的抗日活動由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其時香港既出現了中共領導的抗日文學活動，當視作一種進步。謝書特闢一節「抗戰初期的文化中心」，論說的重要根據正是香港《立報》的表現：「從上海來的薩空了，正主編從上海遷來剛復刊不久的《立報》，鑑於當時香港新文化已趨繁榮，新文學已茂盛開放，他在1938年4月2日《立報》副刊『小茶館』上，以筆名『了了』發表文章〈建立新文化中心〉，主張香港應代替上海而成為抗日戰爭時期的文化中心。」⁵

幾年後，劉登翰主編、多人合撰的《香港文學史》也提到，抗戰開始之後，由於香港相對較為安全，「陸陸續續有內地的人士南下香港，其中就有一大批進步作家。在中共南方臨委的組織和領導下，這批進步作家迅速在香港掀起了第一次文化高潮，對香港舊文學進行了猛烈的衝擊，並扶植了正在萌發的新文學陣營，使香港新文學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⁶這顯然參考了謝書的說法，但也稍作調整：「抗戰期間，由於香港特殊的政治環境，使得南來的左翼和右翼的作家之間出現了一些微妙的關係，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然而，這兩個團體在抗戰這一政治信念上還是比較一致的。」⁷沒有完全抹煞右翼的角色，而以政治信念（抗日），以及隱含的愛國、民族主義，作為兩者的共通點。

由於毛澤東說過，「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⁸充滿軍事意味的「佔領文化陣地」常用來描述左翼在文藝界的成績，如歷史學者袁小倫〈統一戰線與文化陣地〉一文，把香港《立報》和《文藝陣地》、《光明報》等報刊，保衛中國同盟、文協香港分會等組織，歸類為「戰時〔包括抗戰和內戰時期〕中共運用統戰策略在香港所佔領的文化陣地」。⁹統戰本來是一種

⁴ 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33。

⁵ 同上注，頁40-41。

⁶ 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頁81-82。

⁷ 同上注，頁83。

⁸ 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載《毛澤東集》（香港：近代史料供應社，1975年），第七卷，頁74。本書以初出或較早的文章版本為底本，注明與其他通行版本的文字差異。此文所用的底本出自1947年版《毛澤東選集續編》。原文撰於1939年10月。

⁹ 袁小倫：〈統一戰線與文化陣地〉，載袁小倫：《粵港抗戰文化史論稿》（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43。

靈活而現實的調度方式，通過求大同、存小異的妥協，爭取和次要敵人聯合，以對付主要敵人。何謂「大」，何謂「小」，視乎現實情況而可以有靈活的解釋。但如只有「同」、沒有「異」，像已經穩穩佔領的陣地，就不再需要統一戰線了。

近年出版的侯桂新著《文壇生態的演變與現代文學的轉折——論中國現代作家的香港書寫：1937-1949》，所研究的範圍以往正是「統戰」這一術語大派用場之處，但侯書另闢蹊徑，以中國作家在香港「如何以文學想像的方式從事對現代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建構，以及這種建構所帶來的現代文學質地的變化」，作為考察角度。¹⁰ 侯氏嘗試把重點放在具體的作家身上，而並非把文藝簡化為政權鬥爭時如臂使指的工具，或者重述勝利者天與人歸的大歷史，本是一種突破；而該書材料之豐富、思想之開放，更超越以上著作，可惜仍沒有徹底擺脫靜態的政治為先觀念，如〈現代傳媒與「想像的共同體」〉一章，討論「現代傳媒作為重要平台對民族主義傳播所起的作用」，侯氏特別強調「黨派政治對傳媒生態的影響」，認為「可以『體制化』來加以概括」，這是因為「作家們南來之後，多數並沒有切斷和內地的聯繫。尤其是那些與組織關係密切的黨派作家，他們一舉一動的背後，大都是奉命行事，這使得南來作家的文學生產具有很強的體制化特點，『計劃性』和『規劃性』很強」。¹¹ 此章分析「黨派政治與傳媒生產的體制化」的一節，也就以兩個獨立的小節敘述「共產黨對傳媒生產的組織領導」、「國民黨等對傳媒生產的組織」，其下各開列國共兩黨控制的報刊和團體名單，儼然此疆彼界，刊物和組織的政治屬性沒有絲毫含糊。¹²

侯書並未忽略非直屬於政黨的報刊，如《立報》、《星島日報》、《大公報》等「原以商業化大眾化為目標的報紙」，都在「香港南來作家的『共同體』想像平台」一小節中予以交代。¹³ 不過，說到讀者的數量，《星島日報》以及《華僑日報》、《香港工商日報》遠遠超過其他報刊，卻沒有得到相應的討論篇幅。¹⁴ 美國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

¹⁰ 侯桂新：《文壇生態的演變與現代文學的轉折——論中國現代作家的香港書寫：1937-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3。

¹¹ 同上注，頁15。

¹² 同上注，頁67-77。「國民黨等對傳媒生產的組織」小節的最後一段簡略提到國共以外的政治勢力：「共產黨、國民黨、汪系以外，戰前戰後在香港還有一些黨派也創辦了自己的機關報，如福建軍閥陳銘樞的《大眾日報》（1934年創刊）、第五路軍的《珠江日報》，以及前述民盟等民主黨派的《光明報》等。不過這些政黨和軍事勢力相對較弱，對文藝的組織更遠不能和國共兩黨相比，而且事實上民主黨派後來都成為共產黨的支持者和追隨者了。」（頁77）仍是「機關報」的思路。

¹³ 同上注，頁58-67。「以商業化大眾化為目標」是侯氏的原文，見頁64。

¹⁴ 關於《華僑日報》和《香港工商日報》，侯書正文只有這幾句：「本地原有的著名商業報紙，《星島日報》之外，尚有《華僑日報》（1925年創刊）、《工商日報》（1925年創刊）和《成報》（1939年創刊）等，亦無不關注時事政治，尤其是重大事件，而這也符合各報的商業利益，因為這些是當時讀者愛讀的內容，有助於增加報紙銷量。」（頁64-65）

(Benedict Anderson) 提出歐美民族主義起源和傳播的基礎是印刷資本主義，¹⁵ 侯氏借鑑其說，認定在近現代的中國和香港，大眾傳媒——尤其報刊——對民族共同體的想像效果同樣最為宏大。¹⁶ 必須注意，安德森說「報紙是『單日的暢銷書』」，「報紙的讀者們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樣的報紙也同樣在地鐵、理髮廳、或者鄰居處被消費時，更是持續地確信那個想像的世界〔指「想像的共同體」，即「民族」〕就植根於日常生活當中」，¹⁷ 並沒有討論暢銷的報紙可能不止一種。在報社而言，通力合作建構單一的民族共同體想像，並非他們的基本目標。反之，為了爭取讀者，他們必須樹立獨特的品牌。這期間民族和其他共同感（如社會階層、族群、品味）同時創造出來，與敵對品牌比拼影響力。¹⁸ 進一步說，即使報社原來的目標僅是營商，只要具備一定的影響力，也難免為政治力量所滲透。因此，不僅報紙之間存在競爭關係，報社之內也常常是社會上各種勢力爭逐的縮影。

侯書沒有用政治立場來評價特定報刊在文學史上的貢獻，當然是學術研究的進步，但把「媒體」視作平滑無縫的「話語」通道，即政黨或政黨的領導者通過媒體，傳播他們的思想、觀點、政策、意識形態等，仍未脫出政治控制文化生產的窠臼。媒體對「話語」的生產是否有更積極的角色？這應該通過真實的個案來求證。在香港《立報》的案例裡，侯書把報社的立場變化概述為以支持共產黨始，以親近國民黨終（詳見下文），這是實況嗎？本文將從關於《立報》在香港復刊及其核心人員的不同說法切入，考察相頡頏的勢力如何塗改該報原來的面貌，藉此為抗日戰爭時期香港文學生產機制提供一種新的觀察。

關於《立報》在香港的復刊

《立報》在香港復刊，侯書這樣敘述：

1937年11月13日，上海淪陷，僅僅創刊兩年卻在當地大受讀者歡迎的四開小型報《立報》被迫停辦，股東散伙，社長成舍我遠走漢口，薩空了途經香港，救國會的張〔章〕乃器等勸他在香港把《立報》再辦起來。負責中國共產黨香港辦事處的廖承志、潘漢年得知，即以中共名義投資三千元港幣，促成此事。國民黨人陳誠等亦擁有股份。1938年4月1日，港版《立報》創刊，由薩空了任總經理兼總編輯。……創刊當日，……一版的〈本報發刊致詞〉中說：「香

¹⁵ 參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¹⁶ 侯桂新：《文壇生態的演變與現代文學的轉折》，頁56-59。

¹⁷ 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頁36。

¹⁸ 參樊善標：〈閱讀香港《新生晚報·新趣》一九五一年的短篇故事——管窺「香港意識」的生產和傳播〉，載樊善標、危令敦、黃念欣(編)：《墨痕深處：文學、歷史、記憶論集》(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年)，頁526-27。

港《立報》，在經濟方面，雖然和上海《立報》，是兩個不同的獨立組織，精神方面，卻完全一致。……」……《立報》不僅在言論方面鼓吹抗戰，宣傳進步，同時由於它經常刊登關於中共的新聞，反映陝北抗日根據地的情況，引起了一些敏感的青年讀者的注意，就跑來報社，表示要去陝北參加抗日的願望，希望編輯給予幫助。經中共組織研究決定，由薩空了做初步考察工作，然後將這些年輕人介紹給廖承志，再由廖介紹到廣州，從廣州安排去延安。不過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太長時間，不久與國民黨接近的成舍我來到香港，由於觀念和立場不同，兩人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1938年9月，薩空了被迫離開報社，遠赴新疆。¹⁹

這段文字有三個重點：(一)《立報》在香港復刊由原總編輯兼經理薩空了(1907-1988)主導，原社長成舍我沒有角色；(二)復刊資金來自中共，但某些國民黨人也有投入；(三)香港《立報》在言論上支持中共，薩空了也協助吸納支持中共的青年讀者，直至被成舍我迫走。

按照常理，既然資金主要來自中共，香港《立報》為其喉舌，當有可能；後來中共代理人的薩空了被國民黨代理人的成舍我排除，則或許由於股權的變化。但如此推測的前提是：侯氏所據的史實沒有錯誤，薩、成的政治立場也如他所言。政治立場的問題較為複雜，留待下文討論，這裡先考查史實問題。

侯氏的資料來自薩空了的口述回憶〈我與香港《立報》〉，以及研究者李谷城的《香港報業百年滄桑》。其實李谷城的資料也來自薩空了，但最關鍵的一點——「國民黨人陳誠等亦擁有股份」——並不見於薩空了的口述，李氏也沒有交代他的根據。²⁰事實上，薩空了的回憶是現時可見有關香港《立報》營運最詳細的說明，第一、二節的標題「中國共產黨支持我創辦香港《立報》」、「宣傳黨的主張，輸送革命青年去延安」，²¹為香港《立報》的政治屬性定了調，研究者幾乎都沿用薩氏的說法，複述薩氏提供的資料。²²侯氏的引述基本準確，但不妨節引薩空了的原文如下：

¹⁹ 侯桂新：《文壇生態的演變與現代文學的轉折》，頁61-62。

²⁰ 薩空了口述、其女兒薩芸執筆的〈我與《立報》〉1984至1985年分六次載於《新聞研究資料》(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總第25至30輯。第六篇〈創辦香港《立報》〉收入鍾紫主編《香港報業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時，改題〈我與香港《立報》〉。其後祝均宙、蕭斌如編《薩空了文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年)仍用原來的題目。各版本內容一致。李谷城《香港報業百年滄桑》(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所用為《新聞研究資料》本，侯佳新所用為《香港報業春秋》本，本文所用則為《薩空了文集》本。李谷城書簡介香港《立報》，見頁168。

²¹ 薩空了：〈創辦香港《立報》〉，頁64、67。

²² 如上文提到過的袁小倫〈統一戰線與文化障地〉，用來證明香港《立報》是中共文化障地的三點：薩空了「在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3000元港幣的資助下，《立報》在香港復刊」；「茅盾應邀主編該報副刊『言林』，團結了一批香港和內地作家、記者，登載了一批思想性很強的文章」；「廖承志獲悉當《立報》發表介紹陝北的文章，一批愛國青年來到報社要求到延
〔下轉頁316〕

當時〔約指1938年初〕，上海《立報》的股東已星散，社長成舍我在武漢。要創辦一張報紙得有資金，到哪兒去籌錢呢？適值此時廖承志、潘漢年同志都在香港，擔任中國共產黨香港辦事處的工作，在皇后大道中開着一爿公司作為掩護。廖承志同志對《立報》一向很支持，認為這張報紙辦得好。潘漢年同志是我在上海時，通過胡愈之同志介紹認識的，也一直很關心《立報》。因此，他們得知此事後，就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投資三千元港幣，讓我把《立報》再辦起來。在香港辦報，首先得向香港政府辦理登記手續。當時主辦《立報》的負責人是，因而我就成了香港《立報》的發行人，並且按照當地的慣例，把我的名字印在報頭下面。²³

薩空了在後文重申：「香港《立報》創辦時，原上海立報社社長成舍我不在香港。因此，我用共產黨的錢辦起香港《立報》這一情況他並不知道。」²⁴從豐富的細節看來，薩氏是《立報》復刊的重要人物大抵無疑，問題在於原創辦人成舍我，可有參與其事？如何參與其事？

成舍我提到香港《立報》最多、寫作時間也最早的是〈由小型報談到「立報」的創刊〉（1952），²⁵但文中完全不涉及《立報》在香港復刊的經過。多年後才輕描淡寫地說，「七七抗戰，京滬淪陷，我將立報移香港出版」，但這篇文章主要是談老下屬卜少夫，《立報》復刊只一語帶過。²⁶不無巧合，在薩空了發表《立報》回憶後一年，馬之驢編著了《新聞界三老兵》。此書材料來自訪問及「三老兵」的著作，定稿經受訪者審閱，也可算是當事人的回憶。²⁷其書第二篇第六章〈香港立報〉的第一節「立報在香港復刊經

〔上接頁315〕

安情況後，特地讓薩空了等先初步考察這批青年，並從中把素質好的介紹給八路軍駐廣州辦事處安排去延安」（頁47-48），都出自薩氏。侯桂新引述的細節更多，見《文壇生態的演變與現代文學的轉折》，頁61-62。

²³ 薩空了：〈創辦香港《立報》〉，頁64-65。

²⁴ 同上注，頁71。

²⁵ 此文原分兩次發表於香港《新聞天地》：〈「小型報」的遠景——想起十年前手創的立報（上）〉（總第228期〔1952年6月28日〕，頁10-15）及〈從上海到香港——想起十年前手創的立報（下）〉（總第229期〔1952年7月5日〕，頁17-20）。後來稍作修訂，題目改為〈由小型報談到「立報」的創刊〉，載於《報學》半年刊第7期（1955年4月），又收入成舍我《報學雜著》。其實該文所談不止上海《立報》創刊，更包括小型報與小報的區別，以及香港《立報》在太平洋戰爭前一月是否有過預警的問題。

²⁶ 成舍我：〈正氣凜然大節無虧的老友卜少夫〉，載劉紹唐（主編）：《卜少夫這個人（續集）》（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頁218。

²⁷ 馬之驢〈自序〉：「假如說本書有些特點的話，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資料，具有『真實性』，因為第一、每一章節，都是根據作者編排的架構，分請『老兵』們〔曾虛白、成舍我、馬星野〕作一次口述錄音，再參考有關資料寫成初稿。最後，仍請『老兵』們親自過目，並加補充，始能完稿；第二、有少數章節的內容，本來就是由『老兵』們已發表的資料，『改寫』、『擇要引證』、『原文輯入』而成。」見馬之驢（編著）：《新聞界三老兵》（臺北：經世書局，1986年），頁2。

過」，明確地說，上海《立報》停刊後，「成先生自己則先去香港，準備把『立報』在香港復刊」。²⁸第六節「人事簡介」又說：「薩在『上海立報』時，是經理部的副理，上海淪陷後，『立報』決定在香港復刊，均由薩籌備復刊事宜，對工作表現，一向殷勤負責，創刊後升任經理。」²⁹綜合兩節的說法，馬書顯然承認薩空了是實際的籌備者，但堅持復刊出於成舍我的指示，暗示香港《立報》的主導權從來都在成氏手中。

回頭再看「國民黨人陳誠等亦擁有股份」之說。李谷城沒有交代他的依據，但成舍我的舊同學、老下屬吳範寰，有類似而更詳盡的回憶：

〔上海淪陷後，成舍我到了漢口。〕辦報不成，乃在政治上另找出路，漸和陳誠發生了關係，當上了軍委會政治部的設計委員，同陳誠往還甚密。1937年冬，成見戰局不妙，漢口已非久居之地，於是由漢赴香港，先計劃在港恢復《世界晚報》，後因資金無着，乃決定從各方面籌湊資金創辦香港《立報》。所籌得的資金來源相當複雜，陳誠、李書華等都有股份，也有些左翼人士出過資金。……成舍我因在漢口時期和陳誠等發生了關係，從國民參政會第一屆起，即以所謂社會賢達的資格，被蔣介石指派為國民參政員。……到香港後，被陳誠派為駐港代表。……成舍我當上了國民參政員以後，往來重慶、香港之間。在港時初和王雲五、傅傳霖等結識，後與國民黨中宣部所辦的香港《國民日報》主持人陶百川、陳訓畚等往還甚密，並由陶、陳等要國民黨中宣部每月付給《立報》津貼港幣800元，由吳鐵城的駐港機關按月支付。³⁰

吳範寰和成舍我最低限度在1938年9月仍維持良好關係，因此薩空了離開香港《立報》，吳氏獲任命接手。³¹但吳氏1949年後留在中國大陸，後來在國共對立的情境下追述過往，難免把複雜的事態簡化為兩種立場的截然對壘，因此文中時見吳氏因為成舍我的政治立場而同時非議他的人格。但此文最初發表於1964年，上引文為1982

²⁸ 馬之驢：《新聞界三老兵》，頁240。

²⁹ 同上注，頁248。

³⁰ 吳範寰：〈成舍我與北平《世界日報》〉，載張友鶯等：《世界日報興衰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82年），頁22。此文前有編者案語：「本文錄自《文史資料選輯》第43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64年3月出版）。因作者現已去世，本書選錄時，由編者根據盡量保留史實的原則，對文字作了一些刪節。」（頁12）據吳氏此文自述，他和成舍我是小學、大學同學，在成氏創辦的《世界日報》任經理，前後十五年（頁12）。「傅傳霖」當是「徐傳霖」之訛，梁漱溟〈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發起成立之經過略記〉文末〈附記在香港一段政治鬥爭生活之大略〉：「民社黨舊名『國家社會黨』，有《國家社會報》在港出版，內容陳腐，銷數甚少。社長徐傳霖（粵人，舊國會議員）難於支持，將去南洋新加坡等處向華僑募捐。」見梁漱溟：《憶往談舊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頁165。

³¹ 薩空了〈創辦香港《立報》〉：「我向成舍我提出離開香港《立報》，他同意了。接替我工作的是原《世界日報》的同事吳範寰，他是成舍我的老同學。」（頁72）

年的版本，都比薩空了的回憶及馬之驢的訪問為早，在薩、馬（成）論說之外，提供了不同的資料，仍值得重視。³²

相對於薩空了說《立報》的復刊由中共支持，吳範寰更強調國民黨的參與，而且不僅在始創時期。抗日戰爭爆發之初，中國接連失利，至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繼陷落，政府從南京遷至武漢，蔣介石委任親信陳誠為武漢衛戍司令部總司令，兼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³³陳誠身負保衛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重任，不大可能親到香港參與《立報》的復刊籌備，但新成立的政治部，職責在於軍隊的政治訓練，以及全國的民意宣導、文化宣傳等，陳誠上任之初，即在武昌召集了全國政工會議，其中一項強調的任務是「運用宣傳力量，統一全國輿論，粉碎日軍戰意與野心」。³⁴上海淪陷之後，香港作為向全國發布消息的基地更形重要。³⁵《立報》向來鼓吹國民責任，支持民族復興，³⁶政府如能協助該報在香港復刊，當有助於執行上述任務。更需要注意的是，國共兩黨名義上合作抗日，政治部的成員包括了不少中共或親共要人，如副部長是周恩來，第三廳廳長是郭沫若，其時「陳誠同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主張有同有異。同者，都要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抗戰的勝利；異者，各自仍有不同的政治信仰與奮鬥目標。這就形成了陳誠與周恩來、郭沫若等人之間的極其微妙而複雜的關係」，³⁷這種關係應當不限於陳、周、郭三人，而是普遍地體現在社會的不同層面上。³⁸

³² 據說吳範寰此文和同時收錄在《世界日報興衰史》其他文章的很多內容，成舍我並不同意。唐志宏《嘗試與突圍——成舍我與中國近代報業（1919-194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3年）：「筆者曾向成舍我四女成露茜問及此書，其內容所載的真實性如何？成〔露茜〕教授回憶說，她也曾在該書出版時，向其父親求證過，成舍我回覆說內容錯誤頗多，書中很多引述他的話，他本人是從未說過的，不知所謂何來。」（頁16，注29）

³³ 陳誠《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年）：「我是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一日奉命為武漢衛戍總司令的，同月十一日復被命為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保衛武漢的重責大任，幾完全集中於我一個人的身上。」（頁52）另參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1977年），頁605。

³⁴ 參考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臺北：台灣先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2版），頁207-8。

³⁵ 袁昶超《中國報業小史》（香港：新聞天地社，1957年）：「在太平洋戰事發生前，香港僑報的地位非常重要。因為我國沿海城市，在抗戰初期已告淪陷，上海租界也變成孤立，時常感受敵偽的威脅，唯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抗日報紙還可以存在，繼續對海外華僑宣傳，而這些報紙的記者，也能夠安全地活動。」（頁75）

³⁶ 《立報》在每版報邊各有一句標語，創刊日（1935年9月20日）第一版的標語是：「每人皆認識本身對於國家的責任然後才可達到民族復興的目的。」見舍我紀念館「數位典藏」的《立報》原刊圖像，<http://newsmeta.shu.edu.tw/shewo/searchDetail.jsp?id=1193509200105>（2016年11月19日檢索）。後來在「每人」之前加上「必」字，以作強調。

³⁷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208。

³⁸ 李書華與成舍我的關係可以追溯至1928年。是年國民政府籌設北平大學區，任命李書華為副校長，成舍我為秘書長。參唐志宏：《嘗試與突圍》，頁118。後李書華在1938年任國立〔下轉頁319〕

衡量以上各種說法，中共出資港幣三千元雖是薩空了的一面之辭，卻未必不可信，但不是真相的全部。馬之驩說，「成先生在香港，財力人力都不能得心應手」，³⁹似乎暗示有些不方便說明的資金來源。由於目前未能在香港政府檔案處查得《立報》的註冊資料，這一問題暫時無法圓滿解答，只能稍作推斷。香港政府「一九三三年修改印刷條例」規定，「凡報紙註冊，須繳保證金三千元，其利息率，與庫務司所訂之貯款利率相同」。⁴⁰「一九三三修改印刷條例」源自1927年的條例（“Printers and Publishers Ordinance, 1927”），其後幾次修訂，香港大學“Historical Laws of Hong Kong Online”收錄的1939年修訂本顯示，保證金的數額仍是港幣三千元。⁴¹那就表示，在1938年，三千元並不足夠在香港創辦一份報紙。上述條例有一但書，如有政府認可的一至二位保證人擔保，則可豁免保證金。⁴²不過薩空了和其他資料都不曾提到哪位香港有名望的人曾擔保《立報》，⁴³那麼中共以外的財源就不可缺少了，其中包括成舍我個人和國民黨的資本，應該是很合理的推斷。⁴⁴如果這一推斷無誤，香港

〔上接頁318〕

北平研究院副院長，受命在昆明設立辦事處，負責研究院內遷事宜。參林文照：〈北平研究院歷史概述〉，《中國科技史料》1989年第1期，頁18。李氏也不大可能長期留在香港，他究竟有沒有參與，或以甚麼身份參與香港《立報》，仍待考査。

³⁹ 馬之驩：《新聞界三老兵》，頁240。成舍我〈由小型報談到「立報」的創刊〉也說過：「香港立報，在出版時，即未敢多集資本，和上海一樣，充分設備，大舉經營，也就早已準備，萬一犧牲，損失不至太大。」（頁141）

⁴⁰ 香港年鑑社（編輯）：《香港年鑑：一九三四年》（香港：香港年鑑社，1934年），「政治」，頁27-28。

⁴¹ “Printers and Publishers. No. 25 of 1927,” p. 1720. <http://oelawhk.lib.hku.hk/items/show/1603> (2016年10月31日檢索)

⁴² 同上注，頁1721。

⁴³ 薩空了〈創辦香港《立報》〉：「香港《立報》的創辦完全是由於救國會的同志們的支持，中國共產黨的資助，以及廣大讀者的要求和宣傳工作的需要才匆忙決定的。因此各種條件都很差，編輯力量也很緊張。」（頁71）

⁴⁴ 香港《立報》第二版報邊上的標語改為：「擁護整個國家利益犧牲一切黨派偏見必如此始能復興民族克服國難。」這裡的「一切黨派」當然可以包括國共兩黨。這條標語用來取代上海《立報》第四版的「只要少吸一枝烟你準看得起只要略識幾百字你準看得懂」。見世舍我紀念館「數位典藏」的《立報》原刊圖像，<http://newsmeta.shu.edu.tw/shewo/searchDetail.jsp?id=1193804040213> (2016年11月19日檢索) 及 <http://newsmeta.shu.edu.tw/shewo/searchDetail.jsp?id=1193511010409> (2016年11月19日檢索)。1942年初，香港淪陷後日本駐港憲兵隊破獲國民黨的秘密機關，得到的情報顯示國民黨在香港的宣傳機關包括《國民日報》、《大公報》、《星島日報》、《立報》四家報社在內，見姬田光義（編、解說）：《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挙狀況》（東京：不二出版，1988年），頁361-68。李盈慧認為這份文件並不完全準確，除《國民日報》外其餘三家都不是國民黨的報紙，特別是《星島日報》和《立報》雖然支持抗戰，「但不一定與國民黨立論一致」。見李盈慧：〈淪陷前國民政府在香港的文教活動〉，載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店：國史館，2000年），頁470。然而所謂國民黨宣傳機關未必完全由國民黨成立或控制，而且此一情報與吳範寰所說相合，值得相信。

《立報》從資金上看並非中共佔領的文化障地，但中共以及其他勢力對它的實際影響有多大，則需要從運作情況予以評估。

關於香港《立報》的核心人員

香港《立報》的人員編制，現時有資料可供討論的，主要是社長、總編輯、總經理、發行人，以及三個副刊「言林」、「小茶館」、「花果山」的編輯。這些崗位上的人員，也正是報紙面貌的主導者。

這裡仍舊從當事人的回顧說起。根據薩空了，「香港《立報》於1938年4月1日創刊，總編輯和總經理由我擔任。……〈言林〉由茅盾兄主編，……〈花果山〉，由於一時找不到人，也由我兼編。……〈小茶館〉，仍然由我主編，還是刊登讀者來信和我寫的雜談」。⁴⁵及至薩空了離開，「接替我〔薩空了〕工作的是原《世界日報》的同事吳範寰」。⁴⁶由於吳範寰在《世界日報》任經理十五年，推測他接過的只是薩空了總經理的職權，而不包括總編輯和副刊編輯的任務。⁴⁷薩空了又說過，他是香港《立報》的發行人，名字按香港慣例印在報頭下，「直到1938年9月我離開該報，發行人仍然是我，其實以後的香港《立報》與我已經沒有關係了」。⁴⁸翻查香港《立報》原刊，1938年12月11日起，報頭下的發行人名換成陳玉山，1939年9月14日起再換成吳伯安，直至停刊。⁴⁹

馬之驢編著的《新聞界三老兵》則說，香港《立報》

在組織方面，原則上仍與上海「立報」一樣，在社長以下分編輯、經理兩部。

……

(一) 編輯部 總編輯職務仍由成先生自己兼任，以下分編、採兩組。

(二) 經理部 薩空了擔任經理〔，〕以下分：發行、廣告兩組。⁵⁰

⁴⁵ 薩空了：〈創辦香港《立報》〉，頁65。

⁴⁶ 同上注，頁72。

⁴⁷ 一個側面的證據是成氏親姪成曉午的回憶：「日軍侵港時叔父正在重慶出席國民參政會，經理吳範寰隱居九龍，不到報社。」見成曉午：〈緬懷叔父成舍我〉，載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頁187。成曉午在該文自述，1938年夏到香港《立報》工作，至香港淪陷、報紙停刊才離開。

⁴⁸ 薩空了：〈創辦香港《立報》〉，頁65。

⁴⁹ 陳玉山（陳良猷）是香港《立報》的經理，也是成舍我的同學；吳伯安則是吳範寰的別名。據張子燮：〈香港《立報》的片斷回憶〉，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47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34-35。張子燮在該文自述1939年初考入香港《立報》當練習生，其後任編輯、記者。

⁵⁰ 馬之驢：《新聞界三老兵》，頁241。

又說三個副刊，

第一是「言林」，屬於新文學方面的，由茅〔茅〕盾主編；第二是「花果山」，屬於舊文學方面的，由卜少夫主編；這兩個副刊的名稱，都是延續「上海立報」的。此外，為配合當地讀者的口味，又編一地方性的副刊，取名「小茶館」，專寫當地的趣聞軼事，以吸引讀者，特別請一位廣東人王皎我主編。⁵¹

雙方說法可列表對照如下：

職位	薩空了之說	馬之驢之說
社長	——	成舍我
總編輯	薩空了	成舍我
(總)經理	薩空了	薩空了
發行人	薩空了	——
「言林」	茅盾	茅盾
「小茶館」	薩空了	王皎我
「花果山」	薩空了(兼)	卜少夫

馬之驢有些明顯的錯誤，令人費解，但不能因此就全面質疑他的說法。⁵²馬氏指成舍我是社長，薩空了則完全沒有提到社長一職，卻也沒有明確否定成氏是社長。他說《立報》復刊時成舍我不在香港，這或許是關鍵。⁵³不過即使籌備復刊時成舍我不在香港，他對香港《立報》的控制權仍不應低估，因為四個多月後，薩空了離職他去，就是由成氏的多年合作伙伴吳範寰接任社長的。總編輯的問題，似乎也可循類似的方向推想，即復刊之初，由薩空了行使總編輯之權，其後成舍我逐漸增加介入，以至雙方最後分道揚鑣（詳細討論見下文）。

⁵¹ 同上注，頁245-46。

⁵² 「言林」、「花果山」、「小茶館」都是上海《立報》原有的副刊，其內容簡介參李時新：《上海《立報》史研究（1935-1937）》，頁59-77。香港《立報》的「花果山」以各地通訊、諧趣的時事短評為主，另有一些時人的詩詞，並連載過張恨水的小說。

⁵³ 據中國大陸學者劉家林的〈成舍我編年紀略〉，1937年11月25日上海《立報》停刊，《大美晚報》將《立報》人員自總編輯以下接收過去，「成舍我自己則經南京、武漢南下香港，準備在港重辦《立報》」（頁304），但並未說明成氏何時抵達香港。臺灣學者唐志宏的〈成舍我先生年譜簡編〉引述另一位中國大陸學者方漢奇所編《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的說法，指「香港《立報》是由中國共產黨香港辦事處投資3000元港幣，支持薩空了辦起來的，後來因成舍我於8月間接辦《立報》後，因其反共立場，迫使薩空了離港」。見唐志宏《嘗試與突圍》，頁215。方漢奇的原文是：「同年（1938年）8月，當時已來到香港的成舍我在該報進行了反共的宣傳，於是薩空了離開了《立報》。」並沒有「接辦」的意思。見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384。

三個副刊方面，「言林」最初由茅盾主編，並無異詞。可以補充的是，主編職位1939年1月7日轉給親近左派的葉靈鳳，⁵⁴到1941年6月11日由大哀接替。⁵⁵大哀可能是成舍我的筆名。⁵⁶

「小茶館」開始時由薩空了主編無可懷疑。在上海時期，此版主編已是薩空了，讀者來信、編者回應的形式即由薩氏確定下來。⁵⁷香港《立報》創刊日，薩空了（署名了了）在此版「點心」欄發表〈新張的話〉，表明主編身份。⁵⁸薩空了主編「小茶館」共五個多月，⁵⁹此後「點心」欄的作者先是可可，接着是可人。至1938年11月1日，「小茶館」版頭的旁邊有一段啟事，說「本欄已自今日起，延〔吳山〕先生主編，特照前行辦法，『點心』一文，即請先生改用粵語撰寫」。⁶⁰所謂前行辦法，是指7月初本版曾設立一「粵語時事談」，作者為吳山。當時的主編了了解釋，是「感到在香港國語對一般勞苦大眾，實在是『新文言』〔，〕就是有人讀給他們聽，也聽不懂」，所以邀請吳山「就眼前的時事，每天找一個問題用粵語來談一次」。文化程度不高的本地人，只要聽到別人唸出來，就能明白，「這對勞苦大眾認識時事上，一定可以有相當的幫助」。了了又說，吳山是一位廣州中山大學教授的筆名，他本身是廣東人，國語說得非常好。⁶¹「粵語時事談」寫了約十篇就終止。同年11月，吳山成為主編，「點心」欄乾脆用粵語來寫，後來又改名為「粵語講座」，可說是薩空了意念的延續。吳山或許就是馬之驢所說的王皎我。1939年1月1日，江外接編「小茶館」，但不是每天都發表短評。他似乎是直至1939年11月1日併入「花果山」前的最後一任主編。至於可可、可人、江外的身份，皆未能考得。

「花果山」的情況最複雜。薩空了說開始時由他兼編，但沒有交代兼了多久，後來由誰接任。馬之驢說由卜少夫主編，沒有提及薩空了，成舍我的說法相同。⁶²根據卜少夫早年的記錄，他雖然是《立報》復刊前赴港的，但到了年底才開始編「花果

⁵⁴ 葉靈鳳接任的第一天即明言「保持茅盾先生留下的這一份光榮的傳統」。見葉靈鳳：〈編者啟事〉，香港《立報·言林》，1939年1月7日。

⁵⁵ 見大哀：〈也算聲明〉，香港《立報·言林》，1941年6月11日。

⁵⁶ 唐志宏《嘗試與突圍》頁2列出成舍我的筆名，包括：舍、舍我、大哀、百憂、戊戌生、白丁、老成、大哀、丁一、一丁、尊烜、范獨才等，但成露茜確認的筆名只有舍我、百憂、成舍我。見成舍我先生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成舍我先生文集·大陸篇新聞事業》（臺北：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2013年），〈編輯凡例〉第一條，頁xi。

⁵⁷ 薩空了：〈我與《立報》〉第二篇〈辦一張接近群眾的報紙〉，頁12-17。

⁵⁸ 了了：〈新張的話〉，香港《立報·小茶館》，1938年4月1日。

⁵⁹ 了了：〈暫向讀者告別〉，香港《立報·小茶館》，1938年9月14日。

⁶⁰ 當時的「欄」現在習稱為「版」，故吳山從本日起接任「小茶館」主編。

⁶¹ 了了：〈增加了新內容的報告〉，香港《立報》，1938年7月5日。

⁶² 成舍我〈正氣凜然大節無虧的老友卜少夫〉：「適少夫亦來香港，我就邀他主編曾由張恨水主編的一個副刊『花果山』。」（頁218）劉家林〈成舍我編年紀略〉說卜少夫主編「小茶館」，王皎我主編「花果山」（頁304），當是誤倒。

山」。⁶³多年後卜少夫回憶說，他進《立報》是遞補薩空了，⁶⁴這恐怕不準確，因為薩空了在1938年9月14日已經離開《立報》了，中間有兩個多月的空隙。

香港《立報》創刊日「花果山」版頭旁邊有一篇大哀的〈齊天大聖的決心〉，內容相當於本版的發刊詞。⁶⁵隨後五天，同一位置上的短文（沒有欄名）都署名玄奘。⁶⁶由本月7日起，直到10月5日，署名宏宏。宏宏顯然是本版的主篇，⁶⁷但不可能是薩空了，理由有三：（一）宏宏在薩空了離開之後仍然連續發表了近一個月；（二）宏宏有一篇短文列出他逃難來香港的路線，與薩空了完全不同；⁶⁸（三）宏宏自稱是安徽人，薩空了則是蒙古人。⁶⁹那麼薩空了兼編「花果山」，最多只有玄奘署名那五天。⁷⁰用近

⁶³ 卜少夫〈作者小記〉：「七七爆發的當時，我仍在東京，直到八一三的前夕，才回到上海。第二年（廿七年〔1938年〕）三月赴港。……八月初，擔任立報及中山日報的戰地記者工作赴漢，……至是年年底武漢失陷長沙大火後，才取道桂林廣州灣返香港。從廿八年起，我就以立報的撰述（寫社評，譯專稿，辦副刊。）和爪哇吧城新報貴陽中央日報的駐港記者三個職務，工作到廿九年三月。」見卜少夫：《戰地記者講話》（貴陽：文通書局，1942年），頁1-2。從版面可見，卜少夫主編「花果山」是從1938年12月5日開始的。詳下文。

⁶⁴ 卜少夫〈我的老老闆成舍我〉：「我加入立報，大概是遞補薩空了。……我的工作〔是〕編國際版新聞及副刊『花果山』，以後又每天寫社評。」（頁12）

⁶⁵ 〈齊天大聖的決心〉最後一段這樣說：「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向讀者預先聲明。立報的這一塊園地，雖然表面上或許充滿着文章遊戲，但絕不是遊戲而止，他是有最大的使命，隱藏在每一個句子，每一個字粒中間，正如齊天大聖的每一根毫毛，都是包含着無數神妙的作用一樣。」見香港《立報》，1938年4月1日。

⁶⁶ 有一天署名「玄虛」，大概是誤排。玄奘和齊天大聖都是《西遊記》人物，與「花果山」呼應。

⁶⁷ 宏宏在發表的第一篇短文〈鬥戰勝佛〉裡說：「我們希望，這塊園地，發揮她的大力，從事於降妖運動，以達到光明的坦途為止！讀者們，希望你們也來參加這個工作！」這是主編的口吻。「鬥戰勝佛」在《西遊記》裡則是孫悟空到西天後的封號。見香港《立報·花果山》，1938年4月5日。由此可以假定，這一欄的作者就是本版主編。

⁶⁸ 宏宏的逃難路線是，「由北平而天津，由天津而青島，由青島而濟南，由濟南而南京，由南京而安慶，由安慶而下鄉，由鄉下又到安慶，由安慶而華陽，而彭澤，而九江，到了漢口。現在，又由漢口而粵漢路，而廣九路，又來到香港了」。見〈逃難集序〉，香港《立報·花果山》，1938年4月15日。薩空了來港直接得多，「1938年聖誕節前夜，我乘意大利郵船康特凡蒂號隻身離開上海。……當時從上海去內地有一條路線要經香港，於是我旅行的第一站便是香港」。見薩空了：〈創辦香港《立報》〉，頁64。「1938」是明顯的筆誤，因為薩空了說得很清楚，他在上海淪陷（1937年11月13日）之後的12月到香港。見〈我與《立報》〉第五篇〈高潮與結尾〉，頁63。

⁶⁹ 見宏宏：〈談安慶〉，香港《立報·花果山》，1938年6月17日。薩空了早年不願意披露自己的蒙古人身份，連第一任妻子金秉英也不知道，到1950年才公開民族屬性。見薩云：《我的父親薩空了》（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年），頁13-14。

⁷⁰ 但玄奘也不大可能是薩空了，1938年4月6日玄奘〈懷濟南〉：「我屈指計算一下，離開濟南已整整五個月了。」薩空了1937年12月聖誕節前夜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在此之前，沒有提到他先去了濟南。如果相信薩空了的回憶，他是「花果山」最初的編者，則玄奘並非以編者的身份撰寫此欄。而翌日1938年4月7日接寫本欄的宏宏，也同時接過薩空了主編的職務。

似的理由也可以排除宏宏是卜少夫和成舍我。⁷¹但上文曾說，大哀可能是成舍我的另一個筆名。「花果山」的首發文章以成舍我的名義刊出，⁷²不管他當時是否在港、文章是否親撰，似乎都顯示他在復刊的《立報》有重要地位。而且最遲從11月1日起，「花果山」確實由成舍我主編。⁷³

其後卜少夫在12月5日接任，⁷⁴12月22日起以「山中語」作短文的欄名。從此直至1940年8月中旬，「山中語」的作者絕大部份是王三。不過卜少夫其實在1940年3月中已回到內地，「花果山」的編務由他的妻子徐天白承擔，⁷⁵仍然署名王三的「山中語」當即由徐天白所撰。⁷⁶8月中旬至翌年5月底「山中語」沒有作者署名，6月至年底《立報》停刊期間，作者有關公、一丁、大哀、式言、多士、更名。如上所言，一

⁷¹ 卜少夫是江蘇人，據〈作者小記〉頁1-2，1938年8月至年底他在武漢採訪，又說，1938年3月他是從上海前來港的。劉家林〈成舍我編年紀略〉記成氏在1937年上海《立報》停刊後，「經南京、武漢南下香港」（頁289、304），與宏宏的路線有點相似，但成舍我是湖南人。

⁷² 以舍我紀念館「數位典藏」的「新聞檢索」功能搜尋，大哀筆名早見於1932年4月13日的《世界日報》，<http://newsmeta.shu.edu.tw/shewo/searchDetail.jsp?id=s193204130403>（2017年2月27日檢索）。

⁷³ 從1938年11月1日至月底，短文作者多署名一丁，少數日子署名百憂、大哀。成舍我說過他以丁一筆名在香港《立報》發表文章，見成舍我：〈由小型報談到「立報」的創刊〉，頁140。丁一的文章最早見於1935年2月27日的《世界日報》，見舍我紀念館「數位典藏」，<http://newsmeta.shu.edu.tw/shewo/searchDetail.jsp?id=s193502270601>（2017年2月27日檢索）。既然丁一是社長的筆名，其他作者不大可能會把這兩個字倒過來作筆名，而一丁的文章更在前一年（1934年10月7日）已出現於《世界日報》了，見舍我紀念館「數位典藏」，<http://newsmeta.shu.edu.tw/shewo/searchDetail.jsp?id=s193410071001>（2017年2月27日檢索）。

⁷⁴ 卜少夫〈我與副刊〉：「民國廿七年在香港，我在立報（成舍我先生主辦）編電訊、寫短評，兼編副刊『花果山』，汪精衛出走投敵後，我以『王三』的筆名，天天罵汪逆，和追隨他的一批漢奸。」見卜少夫：《人間躑躅》（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頁166。文末注明原載「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四月二日·香港台灣時報」（頁167）。

⁷⁵ 卜少夫〈作者小記〉：「從〔民國〕廿八年起，我就以立報的撰述（寫社評，譯專稿，編副刊。）和爪哇吧城新報貴陽中央日報的駐港記者三個職務，工作到廿九年三月。三月十三日取道海防回國，以貴陽中央日報，與爪哇吧城報的特派記者工作到現在，其間曾參加了桂南戰役。」（頁2）又，成舍我〈「小型報」的遠景〉：「繼少夫先生編花果山的，最初即為少夫夫人，以後由我自兼。」（頁10）案收入成舍我《報學雜著》的版本沒有此段文字。又，成舍我〈正氣凜然大節無虧的老友卜少夫〉：「不久，少夫赴前線任戰地記者，……少夫的『花果山』編輯工作，由他的夫人徐女士接替。」（頁219）又，卜少夫〈我的老老闆成舍我〉：「日本軍隊佔領香港之前，我去了貴陽，天白還代我編了一段時期的副刊『花果山』，這是老老闆的意思，照顧我。以後天白也去了後方，立報停刊。」（頁12）

⁷⁶ 1940年8月11日的「花果山」有一則〈代郵〉說：「徐天白君即離港返國，此後來函請勿寄本欄代轉。渠之通訊地暫為『貴陽六廣門外中央日報王亞明君轉』，請即轉知貴同學是荷。」8月13日起就再沒有王三的「山中語」了，可作為旁證。

丁、大哀很可能是成舍我，但徐天白離開之後，「花果山」是否一直或部份時間由成舍我主編，則無法證實。從以上的整理可以大致了解香港《立報》的權力關係，⁷⁷其中有兩點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是薩空了和成舍我對復刊之初的《立報》同樣具有影響力，也許最初薩空了的主導權大一些，但很快成舍我就取回了權力；二是香港《立報》共出版了四十四個月，三個副刊的主編中，在職時間最長的是親左的葉靈鳳（「言林」，二十九個月）和右派的卜少夫（「花果山」，十五個月，加上徐天白則二十個月），其次則是左派的茅盾（「言林」，八個月）和似乎並非左派的江外（「小茶館」，十個月）。茅、葉和卜、江在報社的時間有所重疊，也就是說在同一時期裡，香港《立報》並存左右兩派的勢力。一般論者都認為香港《立報》的立場是由左轉向右，其實忽略了右派的力量由始至終都存在。不過說左右並存或鬥爭，仍不免是簡化，因為1949年後國共對立和美蘇冷戰的政治格局，與抗戰時期大不相同。三、四十年代的左翼與右翼，關係錯綜複雜得多，並非只有黑白分明的兩種立場。以後觀前，免不了重新詮釋。如果站得遠一點看，不難發現詮釋裡也有權力的顛瀾。

詮釋權的競爭

對照有關香港《立報》復刊和運作的回憶，可以發現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各有強調和淡化之處。在薩空了的回憶裡，香港《立報》的復刊成舍我和國民黨沒有角色，他的說法是「中國共產黨支持我創辦香港《立報》」。然而這無法解釋為甚麼幾個月後，他輕易地向成舍我讓出了主持《立報》的權力。成舍我一方（包括馬之驢）則完全沒有提及中共的資金，對於薩空了，也只說他是經理，而沒有提及他也是總編輯、發行人、「小茶館」主編。⁷⁸其他論者各取所需，延伸這些說法，佐證香港《立報》是中共統一戰線的成果，或者把報上某些言論說成代表整份報紙。

不過在那些回憶裡，仍可以找到啟人疑竇的縫隙，成、薩分手的一幕就是有趣的例子。薩空了說《立報》復刊時，成舍我不在香港，不知道他用了共產黨的資金，但是，「他在漢口和國民黨的關係進一步密切，我也不知道」：

及至成舍我來到香港以後，我們兩人一交談，才發現，我們兩人各自向不同的方向在前進。成舍我知道我接受共產黨的錢辦報後，半開玩笑半正經地說：這也不錯，你拿共產黨的錢，我和國民黨交往，正好左右逢源。事情當

⁷⁷ 此外，據說胡春冰、李素（李健白）都擔任過香港《立報》的總編輯，但資料非常零碎，也不影響本文的論點，因此不一一引述。參張子燮：〈香港《立報》的片斷回憶〉，頁134；李家園：〈令香港人眼界大開的三份報紙〉，頁142。

⁷⁸ 同時也淡化了薩空了在上海《立報》的地位。馬之驢只說薩空了在上海時是經理部的副理。其實薩氏初進《立報》時是「小茶館」的主編，從1936年9月《立報》一周年開始，成為總編輯兼經理。見薩空了〈我與《立報》〉第一篇〈初進《立報》〉，頁7。

然不會是這樣。1938年8月，……我寫了一篇評論，是批判走德意路線的一些人的。當晚發稿後，我就從香港過海到九龍回家去了。……不料，第二天早晨一看送回家裡的報，發現我寫的評論後面加上了反對共產黨、八路軍的話。我看後非常不快，急忙到香港黃泥涌成舍我家，問他這是誰加上去的。他承認是他加上去的。為此我們發生了爭執。這使我明白了，辦一張報紙，決不可能容納兩種不同的立場和觀點，我和成舍我已不能再合作下去了。……我向成舍我提出離開香港《立報》，他同意了。⁷⁹

馬之驢《新聞界三老兵》則說：

後來，〔成舍我〕發現薩空了是共產黨。據說是在上海與共產黨搭上關係的。……以成先生之精明，始終沒有發現薩某是共產黨派來臥底的，因那時候大家的注意力，都用在抗日戰爭方面去了。不過後來也發現一些跡象。……有一次，因「新四軍」與國軍起衝突問題，薩某「受命」寫了一篇（不署名）痛罵國民黨的文章，被成先生「看大樣」時發現了，於是提筆就改，把「罵國民黨」的口氣，稍加改正就變成「罵新四軍」了，原意不動，只是把罵的對象，顛倒過來而已，這都是成先生得意傑作。之後，薩某認為自己在「立報」很難「立功」，遂知難而退，請辭「立報」經理職務，去新疆投靠「新主」了。⁸⁰

薩、馬（成）敘述的情節頗為相類，僅僅政治立場針鋒相對。然而雙方那種國共不兩立的冷戰式思維，與薩空了以下似不經意地提到的一段餘波，又像格格不入：「後來，在我蹲了國民黨監獄兩年〔1943-1945〕，需交保出獄的時候，成舍我和黃少谷曾作了保人。我和成舍我的個人友誼還是存在的，只是事業的合作，從我離開香港《立報》以後就中止了。」⁸¹為甚麼「公仇」和「私誼」能夠並存？

陳平原分析成舍我就讀北京大學時所撰的〈輿論家底態度〉、〈文化運動的意義與今後大規模的文化運動〉等文，⁸²把成氏的觀念向上追溯至北大的學風和師長的提倡，向下連結到成氏日後辦報、辦新聞專科學校的方針，如「輿論家是要往前進的，不可以隨後走的。他是要秉公理的，不可以存黨見的。他是要顧道德的，不可以攻陰私的。他是要事實的，不可以憑臆想的」（〈輿論家底態度〉）等觀點，顯然受到蔡元培校長重視新聞學，以及出版國人自撰第一部新聞著作的文科教授徐寶璜類似主張（「〔新聞應該〕立在社會之前，創造正當之輿論」，「謹慎據實直書」，應代表國民輿論而不是黨派利益）的影響。成舍我在這一時期形成了一種想法，認為新文化運動

⁷⁹ 薩空了：〈創辦香港《立報》〉，頁71-72。

⁸⁰ 馬之驢：《新聞界三老兵》，頁248-49。

⁸¹ 薩空了：〈創辦香港《立報》〉，頁72。

⁸² 舍我：〈輿論家底態度〉，上海《時事新報》1920年4月15日；成平：〈文化運動的意義與今後大規模的文化運動〉，《新人》第5號（1920年8月）。

旨在「增益全世界文化」，「不問新舊中外」（〈文化運動的意義與今後大規模的文化運動〉），並擬通過組織活動來予以落實。成氏「開列出三種從事文化運動最為重要的組織形式，作為日後努力的方向：報館、書局、大學校」。報館、大學校成氏確實不止一次地付諸實踐，書局更在他仍是北大學生時就辦起來了。⁸³因此，不存黨見及以全世界為念，在成舍我的事業起步之前，即已形成。⁸⁴

唐志宏則從報業和新聞學科體制化的過程着眼，指出：

民國時期報業建立專業化的過程，實際上構建出來的可能僅是一種類似觀念的東西，這種觀念希望以教育制度，追求專業性的客觀中立，以使報業脫離當時很難避免的政黨性和政治性，以求安身立命之道。但是，新聞教育制度化的起始，便是一種不向政黨政治屈服，保有報紙批判意識的權力。要實施這種理念，有的人主張必須推進商業化報紙的發展，也有的人主張以新聞教育，做為人材規範的標準，施以新聞倫理道德教化。⁸⁵

唐氏這裡的背景說明，原為解釋成舍我的新聞教育取向，但也可以看到體制化之後，新聞行業和新聞學科兩者相對獨立於政黨政治的可能。據唐氏分析，「對於『大眾化』報紙的主張，是其〔成舍我〕報業活動根本的思想來源」，歸納成氏「大眾化」理念的特點，其中包括「報紙應為大眾服務，不再是為特殊階級而服務，而是直接面向大眾」、「報紙不屬於任何黨派，而是為群眾發聲的」。⁸⁶

本文無意探討成舍我的報學、新聞學，⁸⁷而是藉此指出成氏自有他的取向，不能簡單地歸之於政黨立場。成氏的具體行事，某程度上也和他的主張相應。這裡說「某程度」，是因為其中還有不小的灰色地帶，如成氏堅決否認上海《立報》有官方股份或

⁸³ 陳平原：〈輿論家的態度與修養——作為北大學生的成舍我〉，載《報海生涯》，頁90-91、96-98。引文見頁90、91、96、97。

⁸⁴ 後來成舍我更用上「世界主義」的說法：「民族自決，即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固弱小民族自救圖存之唯一法寶。然民族主義之極權，本有兩途可循：一為世界主義，即大同主義；一即帝國主義，或國家主義。其目的主和平、尚自由。由各民族之親愛和睦，以至於天下為公，此世界主義之精〔義〕也；其目的在主侵略〔、〕行專制，恃一人之威權兵力，以至於統一宇內，此帝國主義之精義也。」成氏支持的，當然是世界主義，見〈世界主義與帝國主義〉，原載南京《民生報》1929年1月15日，轉引自唐志宏：《嘗試與突圍》，頁129-30。唐氏認為成舍我的「世界主義」來自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的「無政府主義」，而「世界主義」正是吳稚暉所倡導「無政府主義」的一個分支。參唐志宏：《嘗試與突圍》，頁128-30。

⁸⁵ 唐志宏：《嘗試與突圍》，頁181。

⁸⁶ 同上注，頁88-89。

⁸⁷ 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考唐海江：〈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成舍我自由報刊理念的形成及其困境〉，載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89-217。

接受官方津貼，但唐志宏查出該報股東確有國民黨要員。⁸⁸不僅如此，成舍我和國民黨還有其他聯繫，然而，唐氏仍肯定「在報業活動上，成舍我基本上還是保持著獨立的特性」，其證據包括成氏在北平《世界日報》時期不排斥馬克思主義、反對國民政府的「統制新聞」制度。與本文關係更密切的，是在上海《立報》時期「任用左派思想濃厚的薩空了任副刊總編及經理」。⁸⁹薩空了的《立報》回憶用了不少篇幅縷述他通過消息報道來對抗國民政府，雖然薩氏刻意指出，在成舍我離開上海後，《立報》加強了反抗的力度，⁹⁰但在此以前該報也不能視作官方喉舌。薩空了承認，「成舍我是一個重才的人，因此他容忍了我，甚至支持了我，讓我在這個崗位上一直工作到上海淪陷」。⁹¹薩氏的判斷是，「成舍我本人對我接近共產黨，思想左傾也是不滿意的，不過他知道我不是共產黨人，而且他明白他抵擋不了時代的潮流」。⁹²掀掉非左即右的對立修辭表象，薩氏的意思其實是他和成舍我的立場並非完全相反。這是二人合作的基礎，甚至是後來合作不成，仍存私誼的原因。

薩空了到1960年才成為共產黨員，⁹³但政治人物的真正身份從來不容易確定，只能在言論和行事的間隙試作窺探。薩空了離開香港《立報》後，一度前赴新疆。1941年周恩來安排他由重慶回到香港，本擬轉赴新加坡成立新聞通訊社，鄒韜奮和廖承志要求他留下來協助梁漱溟創辦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來易名為「中國民主同

⁸⁸ 成舍我〈從上海到香港〉：「我曾特別強調，報館資本，必須全部出自以新聞為職業的同業朋友，不要與任何黨派，發生經濟關係，也絕不要接受任何方式的政府津貼。」（頁17）又：「我們並反覆要約，決不招半份官股，決不請一文津貼，以便出版後對於『立場堅定，態度公正』的最高原則，得以確切信守，不為任何政治關係所影響。」（頁18）唐志宏查閱上海檔案館所藏〈徐永祚會計師事務所於《立報》館公司登記：股東名錄〉（檔案編號：Q492-1-209，1937年2月6日），發現「剛創辦時的《立報》股份結構，部分股東成員帶有明顯的〔國民黨〕CC派標記。比方蕭同茲為『中央通訊社』社長，程滄波為《中央日報》社社長，錢滄碩為『中央通訊社』上海分社主任，同是發起人的潘公展後來接任國民黨上海中宣部和社會教育局（主管報紙營業證照的核許權）。」見唐志宏：《嘗試與突圍》，頁139。上海《立報》曾有政府參與無庸置疑，但有一處細節尚待澄清：〈股東名錄〉上有薩空了作為發起人的記錄，但據薩氏〈初進《立報》〉：「1935年11月1日，我接編上海《立報》的副刊〈小茶館〉，從此開始了我與《立報》的一段關係。」（頁3）薩氏加入時，《立報》已出版一個多月。唐志宏也說「《立報》創刊半年後開始籌設『股份有限公司』」（頁138），所引檔案附有日期「1937年2月6日」，也許這是《立報》運作一段時間後的資本分布，並非最初的情況。順道一提，薩空了的回憶完全沒有說到上海《立報》有國民黨員的股東。

⁸⁹ 唐志宏：《嘗試與突圍》，頁119-20。

⁹⁰ 薩空了〈我與《立報》〉第三篇〈關於「七君子案」的報道〉：「1936年7月成舍我離開上海。《立報》加強了救國會抗日活動的宣傳，作為對國民黨反動行為的回擊。」（頁24）

⁹¹ 薩空了：〈辦一張接近群眾的報紙〉，頁19-20。

⁹² 同上注，頁19。

⁹³ 根據薩空了去世後半月《人民日報》刊登的〈薩空了同志生平〉（1988年11月1日）。見《薩空了文集》，頁409。

盟」，簡稱「民盟」)的機關報《光明報》，因而經歷了年底的香港淪陷之戰，至翌年1月下旬才偷渡出境。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由幾個國共以外的小黨派組成，主旨是「貫徹抗日主張，反對妥協精神，勵行法治」。薩空了後來回顧說，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偉大勝利」。⁹⁴但閱讀薩空了當時寫下的日記，可以看到更複雜的情況。⁹⁵

首先是在淪陷前不到十天，薩空了和一些報業中人商量，把幾份報紙，包括《華商報》、《大公報》、《立報》、《香港國民日報》等，聯合起來發刊，以解決印刷和經費的問題。薩氏當天稍後即遇見《立報》經理吳範寰之弟，告知他有此提議。⁹⁶如果三年前不歡而散，他應該不會這樣願意和《立報》舊人接洽。

其次是薩空了在這段日子裡和梁漱溟密切共事，並且閱讀梁氏的著作，對他的人格、政見、提倡的鄉村建設運動由衷佩服，「肅然興欽敬之念」。⁹⁷薩氏特別提到他閱讀了梁漱溟當時在《光明報》上連載的長文〈我努力的是甚麼〉。⁹⁸此文副題為〈抗戰以來自述〉，其中寫到梁氏1938年1月訪問延安，考察中國共產黨。梁氏說「我始終同情共產黨改造社會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對共產黨不了解中國社會，拿外國辦法到中國來用」。這次訪問是要考察中共有甚麼轉變。⁹⁹他和中共負責人多次見面，與毛澤東談話尤多，考察的結論有好有壞，壞者為中共「仍以階級眼光來看中國社會，以階級鬥爭來解決中國問題」。¹⁰⁰梁漱溟認為彼此的差異在於中國的前路應當怎樣走：他主張「政治上趨於民主化」，「經濟上趨於社會化」，兩者同時進行；中共則主張「在抗戰中實現民主；由於民主進步，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末了進步到共產」。¹⁰¹但在薩空了整部日記裡，完全沒有批評梁氏的觀點。

⁹⁴ 薩空了：〈回憶難忘的一九四一年，悼念羊棗同志〉，《新聞研究資料》第4輯（1980年8月），頁57-58。

⁹⁵ 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詳細記錄了他從1941年12月8日至1942年1月25日的親身經歷和見聞，1943年4月在桂林刪削寫定，未及出版就被國民黨特務囚禁起來，兩年後重獲自由，1946年再到香港，才得以首次出版。見薩空了〈前記〉（1946年），頁xviii。所以此書大致上反映薩氏1941至1943年抗戰期間的想法，也許還摻進了一些抗戰勝利、內戰初期的想法。

⁹⁶ 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1941年12月16日日記，頁67-69。值得注意的是，行文中稱成舍我為「社長」。

⁹⁷ 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1941年12月日日記，頁115-19。

⁹⁸ 同上注，頁118。「努力」上誤衍「所」字。

⁹⁹ 載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92-93。原文在香港《光明報》1941年9月18日至11月3日連載。

¹⁰⁰ 同上注，頁197。

¹⁰¹ 同上注，頁204。

更有意思的是，薩空了在烽火連天之際，重讀翻譯小說《小婦人》(*Little Women*)，竟「感到人與人間不應有什麼仇恨，一切仇恨未嘗不可因雙方之了悟而言歸於好」。¹⁰²這自然不是指中日正在進行的戰爭。他「想到我們眼前需要一部小說，寫三十年來，中國在革命過程中人與物的損失，希望以這種損失之慘痛，喚起在政治上的工作者，懂得如何互愛互諒，今後共同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如果在香港是一個長困的局面，自己很想嘗試一下這個工作」。¹⁰³

薩空了料不到他馬上就要離開香港，沒有機會創作，卻在整理日記之後，寫出了一部《科學的新聞學概論》。¹⁰⁴薩氏其時已從事新聞行業十六年，在北平、上海、香港等地都工作過，一直以「新聞記者為自己的終身事業」，把所編的報紙視作「組成人類歷史記載的一部分」。¹⁰⁵這部著作初版於桂林，為了通過國民政府的審查，出版社細心刪改過，但「基本觀點與主張還未被歪曲」。¹⁰⁶薩氏期望抗戰勝利後，國家按照國民黨總理孫中山的遺教，由訓政時期進入憲政時期，「民眾之言論自由即可充分獲得」。¹⁰⁷在這情況下，「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有政治目的的人，一定都會各辦自己的言論機關，宣傳各自的政治主張，這種現象對中國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大家各憑自己的主張訴諸民眾的判斷，而以各自所辦的報紙為媒介，這是民主的方式」。¹⁰⁸考慮到薩氏寫作時的環境，這番話與其說是前瞻趨勢，毋寧說是據理爭取。此處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左派思想濃厚」的薩空了對未來中國的想像，也僅僅是「帝國主義的桎梏既脫，中國社會的向資本主義之途邁進是毫無疑義的」，¹⁰⁹因此他追求的言論自由，是在憲制保障下的多黨並存、互相競爭。這大抵就是在香港即將淪陷之時，他認為與成舍我的《立報》可以再合作的原因。

在成舍我一方，當也有類似想法。日後成氏對香港《立報》內部的左右派之爭付之一笑：「有人轉告，沈〔沈雁冰(茅盾)〕因我邀少夫入立報，深感不滿，謂少夫係國民黨特務。我不信沈會如此膚淺，但笑告此人，如果沈先生說卜某是國民黨特務，則安知無人說沈先生是共產黨特務。好在此時全國團結，對日作戰，只要認定

¹⁰² 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1942年1月4日日記，頁148。

¹⁰³ 同上注。同樣可圈可點的是，薩空了讀完《小婦人》，接着讀錢穆的《國史大綱》，感想是「這本書在觀點上有許多雖不能與之苟同，但是一本用了力氣寫的書卻應予承認」(1942年1月5日日記，頁153)。

¹⁰⁴ 初版署名艾秋颺，寫成於1943年秋，由桂林文化供應社出版。1947年在香港由文化供應社再版。見薩空了：《科學的新聞學概論》，《民國叢書》第一編影印香港文化供應社1947年版(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再版序言〉，頁1-2。

¹⁰⁵ 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序〉(1943年)，頁xxii。

¹⁰⁶ 薩空了：《科學的新聞學概論》，〈再版序言〉，頁1。

¹⁰⁷ 同上注，〈中國新聞事業展望〉，頁35。

¹⁰⁸ 同上注，頁39。

¹⁰⁹ 同上注，頁35。

日本是我們最大的仇敵，則誰是誰的特務，在我看來，都無關緊要。」¹¹⁰說完全沒有黨派考慮似乎過於超然，但一定程度的包容當無可疑。一來成舍我明白多元化對報社有利，¹¹¹二來文化人還未徹底把意識形態的差異視作勢不兩立。後面一點除了上文引用過的例子外，更生動的是卜少夫當時的描述。1938年春，先後從上海來到香港的文化人，包括卜少夫、但杜宇、戴望舒、葉靈鳳、袁水拍、徐遲、穆時英，甚至胡蘭成等，陸續住進香港島一處名叫太白樓的地方，這些人每週召集一次文藝座談會，「報紙，雜誌，畫報，以及各種小冊子，從這裡〔裡〕散佈到整個華南區，海外區，淪陷區和遙遠的國內的每個角落」。¹¹²在後人的印象裡，這些人政治立場南轅北轍，既有右派的卜少夫，左派的袁水拍，更有汪精衛派的胡蘭成，那時候是甚麼維繫着他們？卜少夫說：

不可否認的，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的狹隘的愛國思想，僅僅出發於單純的國家觀念，這是一個共同的顯著的色彩。理論的根據既然很單純，我們可以說，感情的成分超過理智多多，當然談不上所謂體系，因之，一個問題或一個現象來時，便立刻呈現着片面的推測，或常識的推斷，聯帶而來的自然會是動搖和彷徨了。胡蘭成是有他的一套的，……其餘的人，具體的說，全部像宗教信徒，信仰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他們認為祇有抗戰到底，中華民族前途才有光明。服從政府，也更服從大多數人的主張。¹¹³

可以佐證成舍我後來的說法。

要言之，香港《立報》的營運，並非由單一黨派所主導，但當事人的回憶及由此延伸的研究，往往簡化了該報的主導權力。從本節的分析可見，這是時移世易之後，新政治格局下對舊時代的詮釋或重釋，在文學史的範圍裡，又以左派、中國大陸的詮釋為主流。然而這些畢竟是對真相的簡化，無法通過資料的檢查，不能視之為對歷史的多元詮釋。

¹¹⁰ 成舍我：〈正氣凜然大節無虧的老友卜少夫〉，頁218-19。

¹¹¹ 成舍我以筆名「白丁」所寫的〈談談報尾巴〉說：「平心而論，吾人認為尾巴，既各有各的主顧。即各有各的門市，固不可一筆抹殺編輯人的苦衷，然至少應大家共同向〔以〕下方針努力——報尾巴為公開的、平民的，是啟發民智一個急先鋒，他有神聖使命，不是少數投稿者的俱樂部。即退一萬分說，尾巴文字，至少能避去『無病呻吟』、『麻木』、『無聊』等之流弊。主撰人更應抱定『寧濫勿缺』的決心。設法免除改造一切凡人所不能了解及一班人所最厭惡的稿件。」原載北平《世界晚報》1926年10月28日，轉引自唐志宏：《嘗試與突圍》，頁108-9。「報尾巴」即副刊。

¹¹² 卜少夫：〈穆時英之死〉，載卜少夫：《無梯樓雜筆》（上海：新聞天地社，1947年），頁21-22。原載重慶《時事新報》1940年7月23日。

¹¹³ 同上注，頁22-23。

結 論

香港的文學生產目前可以上溯至上世紀二十年代，從那時起報紙副刊就是機制非常重要的一環，這和香港的社會、文化條件，以及更大範圍的中國大陸政治局勢都有關係。抗日戰爭開始後，大量人口包括不少文化人湧入香港，刺激了香港的報業，強化了報紙副刊的文學生產功能。在上海廣受歡迎的《立報》1938年復刊於香港，多位著名南來文化人或出任編輯，或發表作品，雖然銷量遠遠未如上海時期，但不少香港文學史論著仍大力肯定其副刊的貢獻，箇中原因在於該報的政治立場。

本文重新考察各種相關材料，發現關於《立報》復刊資金和主要人員的通行說法，都有可疑。香港《立報》並非由單一政黨支持，在發刊期的大部份時間裡左右派核心人員並存，這意味《立報》副刊不是特定勢力傳播話語的通道，而是一個競爭話語權力的場地。不過這種面貌在當事人的回憶以及某些由此延伸的研究裡，遭到有意無意的塗改，本文認為是冷戰時代國共對壘格局下的產物，從中可以看到兩個陣營對歷史詮釋權力的競爭。明顯佔上風的是左派的詮釋，但只是數量的優勢，並無充份證據支持。現在國共二元對立的局面早已結束，主流說法失去意識形態魔力的支持，只餘滯後的慣性，正宜重新檢視材料，提出更平允的詮釋。

目前本文僅從資金和核心編輯人員兩方面，證明了香港《立報》的多元勢力——不止國共兩黨，更不是只有中共。至於這些勢力在報社內部如何互相競爭、合作，在外部如何與香港殖民地政府及其他團體、媒體互動，最終落實為版面上的作品，體現場域對文學生產的影響力，仍有待後續的研究。

香港《立報》主導權問題重探

(提要)

樊善標

一九三五年創刊於上海的《立報》以精編和大眾化方針吸引了大量讀者，刷新了中國自有日報以來的發行紀錄。其主要創辦者成舍我(1898–1991)是中國現代著名報人及新聞學教育家，一生在不同地方創辦報紙及新聞專科學校，同時也是參政者。1937年上海淪陷於日本，《立報》隨之停刊。1938年4月1日，《立報》在香港復刊，發刊詞表示延續上海《立報》的精神，版面結構維持不變。但香港《立報》和成舍我的關係，歷來有不同的說法。曾任職上海《立報》並擔當香港《立報》發行人的薩空了，說該報是他運用中國共產黨資金復刊的，成舍我的憶述則完全沒有提及此事，另外的資料指香港《立報》還有其他資金來源。此外，對該報特別是副刊的核心人員，也有極為不同的強調及評價。細察香港《立報》的內容和日後各方的說法，可以發現該報的主導權在當時既為不同的力量所爭奪，日後各方仍在競逐對它的詮釋權。本文從關於《立報》在香港復刊及其核心人員的不同說法切入，考察該報近真的面貌，以及後來相頡頏的勢力如何各自塗抹修改，藉此與當前流行的抗日戰爭時期香港文學生產機制論說作一商榷。

關鍵詞： 成舍我 薩空了 《立報》 香港文學 文學生產

Who is Behind the Scene: A Re-exploration of the Hong Kong *Lih Pao*

(Abstract)

Fan Sin Piu

Established in Shanghai in 1935, the newspaper, *Lih Pao* (*LP*) attracted a huge number of readers with its compressed and popular editorial strategy. The *LP* broke the record for the highest circulation rates since the appearance of daily posts in China. One major founder of the newspaper, Cheng Shewo (1898–1991), was a renowned journalist and journalism educator. He launched newspapers and vocational schools in journalism in different places. He also participated in politics. In 1937, when Shanghai fe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Japanese, publication of *LP* was suspended. It was resumed on 1 April 1938 in Hong Kong. In the founding manifesto, the Hong Kong *Lih Pao* (*HKLP*) promised to inherit the spirit of the *LP* of Shanghai, and retain the layout structure of its Shanghai predecessor.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heng Shewo and *HKLP*. The issuer of the *HKLP* and a former senior staff of the *LP*, Sa Kongliao, recalled that it was he who established the *HKLP* with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le Cheng Shewo's recollection gives no hints of it. Some even said that there were other sources of fund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re were also very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who was the real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HKLP*,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supplements. A close study of the content and later research of the *HKLP* reveals that there were struggles among different camps for the control of the *HKLP*. Through analysing the relaunching of *LP* in Hong Kong and the different remarks on its core members by later researchers, this paper tries to recompose the actuality of the *HKLP*, and to trace out the alterations and modifications of the past by different antagonistic forces. This study also disputes the common discourse on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Keywords: Cheng Shewo Sa Kongliao *Lih Pao* Hong Kong literature
literary production